



21 世纪精品规划教材系列

秦汉文学

QIN HAN WEN XUE

主编◎刘书惠 杨栋



 吉林大学出版社

秦汉文学

主 编 刘书惠 杨 栋

秦汉文学

主 编 刘书惠 杨 栋

 吉林大学出版社

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文学 / 刘书惠, 杨栋主编.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77-4069-3

I. ①秦… II. ①刘… ②杨…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秦汉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520 号

书 名: 秦汉文学

作 者: 刘书惠 杨栋 主编

责任编辑: 仲怀民 责任校对: 仲怀民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320 千字

ISBN 978-7-5677-4069-3

封面设计: 可可工作室

北京市楠海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7 月 第 1 版

2015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秦汉时期，是指秦并六国到东汉灭亡（前 221 年—220 年）这一历史阶段。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人们习惯将汉献帝建安元年（196 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 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称为建安文学，并放在魏晋文学中讨论。为突显文学的时代特征，本书亦按学界传统，将秦汉文学的断代分期上限定于秦之一统天下，下限止于建安之前。当然，为了不割断文学发展脉络、阐明文学演进历程，本书在资料选取方面并不局限于此。另外，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或遵循惯例，或按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均旨在条贯清晰。如吕不韦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和最能代表李斯文学成就的政论散文均作于战国末期，但这些篇章著作对秦代思想文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撰著者又活跃于秦帝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舞台，因此可将它们置于秦代文学中分析鉴赏。又如，孔融、曹操等作家的诗文有些作于建安之前，但是我们为不割裂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仍将它们归于建安文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尽力依照秦汉文学的实际情况勾画出其面貌，系统介绍秦汉时期作家作品、探究秦汉文学发展轨迹、考察秦汉文学时代特征。根据编著主旨、实际用途及论述条理的需要，本书从文体角度将秦汉文学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说明：

绪论“王朝兴衰与文学变迁”，包括“大秦帝国的‘秦世不文’”与“大汉风云中的文学演进”两部分内容。概述秦汉文学演进历程及其与社会变迁、历史更迭及文化发展的关系。对秦、汉两朝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简要说明。

第一编“秦汉散文”，共分五章。秦代散文部分主要介绍了《吕氏春秋》和李斯散文。前者是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杂取各家精华而成，意为秦一统天下大造声势并展现吕不韦与秦王相异的政治观点。后者文采斐然，说理透辟，代表了秦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汉代散文佳作纷出，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列四章分别述之。既概论其总体特征与内容风格的演变，又详析论说散文、历史散文及其他类型散文代表作家作品。

第二编“秦汉诗歌”，从“秦汉诗歌概述”、“汉代乐府”及“汉代文人诗”三方面论列之。秦代诗歌几无所存，只言孤篇亦不能明其时代及整体风格特色，故此部分主要介绍秦代诗歌著录情况，以此推议其创作概貌。汉代诗歌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最有代表性，二者之发展流变、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等均得系统论说，更择《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及《古诗十九首》详细赏析。

第三编为“汉赋”，专门阐说此种最能代表有汉一代文学的文体及作品。汉赋以铺张扬厉的描绘打破了“诗”的传统，以纵横天地的气势承续了“楚辞”的情采，而其润色鸿业的心态又深度契合了雄壮豪迈的大汉气象。无论是骚体赋、散体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都以其独特的美学个性彰显着汉代文学的与众不同。此部分追溯了汉赋的起源，分析了汉赋的

基本特点，并以时代为线索，讨论了各时期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充分展现了汉赋在汉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编“汉代小说”。两汉时期有一类文学作品，它们或以历史传说人物为主人公叙述其事，或以神仙鬼怪为中心彰显其神，抑或以异域殊俗为题大炫其博。我们根据这类作品的文学特征将之归于“小说”。此编两章分别讨论了汉代小说的涵义、影响汉代小说形成的因素，以及“杂史杂传类小说”与“地理博物类小说”的类别特征与代表作品。追溯了魏晋志人志怪小说的肇端。

秦汉文学的研究者代不乏人，秦汉文学的学习者不可计数，但以“秦汉文学”为书名的专著却为数不多，值得称道者唯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杨树增《秦汉文学》等历历可数者而已，教材方面，“秦汉文学”也多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当中，很少有专门的秦汉文学史教材。此次我们编写的《秦汉文学》，虽不能与诸前辈学人、当今方家的成果相提并论，但经过诸番努力也为“秦汉文学”的课程讲授和学习提供了一本较有针对性的教材。希望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及中国古代文学爱好者有些许裨益。

编者

2015年5月

目 录

绪论 王朝兴衰与文学变迁

第一章 大秦帝国的“秦世不文”	(1)
第二章 大汉风云中的文学演进	(6)

第一编 秦汉散文

第一章 秦代散文	(14)
第一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14)
第二节 李斯散文	(25)
第三节 秦刻石	(30)
第二章 汉代散文概述	(32)
第一节 汉代散文内容与风格的演变	(32)
第二节 汉代散文的创作特征	(34)
第三章 汉代子书和论说散文	(37)
第一节 西汉子书与论说散文	(37)
第二节 东汉子书与论说散文	(74)
第四章 汉代历史散文	(92)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92)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108)
第五章 汉代其他题材散文	(117)
第一节 书信之文	(117)
第二节 赞颂碑铭之文	(121)
第三节 游记体散文	(124)

第二编 秦汉诗歌

第一章 秦汉诗歌概述	(126)
第一节 秦汉诗歌著录及创作概况	(126)
第二节 汉代诗歌发展演变	(132)
第二章 汉代乐府	(135)
第一节 从乐府到乐府诗	(135)

第二节	两汉乐府分类	(137)
第三节	汉俗乐府的思想内容	(149)
第四节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158)
第五节	汉乐府诗的艺术特色	(163)
第三章	汉代文人诗	(167)
第一节	骚体诗	(167)
第二节	四言诗	(169)
第三节	五、七言诗	(175)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	(186)

第三编 汉 赋

第一章	汉赋总论	(193)
第一节	赋之定义与起源	(193)
第二节	汉赋分类及其特点	(196)
第二章	汉赋分期及代表作家作品	(201)
第一节	西汉初期辞赋	(201)
第二节	西汉中期辞赋	(210)
第三节	西汉后期辞赋	(224)
第四节	东汉前期辞赋	(234)
第五节	东汉中后期辞赋	(242)

第四编 汉代小说

第一章	汉代小说的产生	(258)
第一节	小说涵义及发展历程	(258)
第二节	小说的文学渊源	(262)
第二章	汉代小说的类别特征及代表作品	(267)
第一节	杂史杂传类小说	(267)
第二节	地理博物类小说	(289)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298)

绪论 王朝兴衰与文学变迁

第一章 大秦帝国的“秦世不文”

在神话中，秦的起源可追溯到颛顼。《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而作为一个小国或诸侯国其初建可溯源到周孝王时期。此时秦人居于“犬丘”，首领名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将其召至“汧、渭之间”，负责周王室养马事宜。后封非子为“附庸”，并让他在秦地建立城邑，并续嬴姓祀，从此非子与他的嬴姓后代定居下来。“秦”进而成为正式的族群名称，嬴秦登上了历史舞台。周平王即位，为避戎狄迁都雒邑，仓皇逃离时秦襄公率领秦兵沿途护送。为谢勤王之功，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把岐以西之地赐给秦，并准许他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秦的地位因此上升为与齐、晋等过地位平等的诸侯国。

秦立国之初，几位统治者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与西部和北部的戎狄作斗争，毕竟在恶劣的环境下保地存国才是此时最为关键的事情，因而政治及文化方面发展缓慢。至秦穆公之时，秦国通过与邻国晋的战争扩大了领土，囊括了黄河以西的土地。公元前623年，周王承认秦“遂霸西戎”。但秦国这种发展态势没有持续下去，魏成功收复晋之失地，秦却国势衰微，正如秦孝公所说：“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之时，秦国仍是一个次等盟外之国。

秦国在春秋时代实力不如晋楚，偏居西部，缓慢发展。战国初年，国势衰微，正如秦孝公所说：“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秦能够能在战国中期迅速勃兴，为统一打下基础，要归功于大胆变法与持续改革。秦献公时期便已在多方面进行了尝试，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废除了秦国沿用近三百年的人殉制度。二年，迁都栎阳，准备与东方的魏作斗争。七年，“初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十年，“为户籍相伍”，实行编户制度，加强人员及税赋管理。献公的改革，推动了秦国的发展，实力日强。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变法，言“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由魏西向入秦，得主变法，进行了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

革：严明法令，推行新法；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再次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普遍实行县制，迁都咸阳等。革除了奴隶社会的旧制度，秦国一跃成为全面实行封建法制的富强国家。孝公死，惠文王立，因新君与商鞅昔有间隙更加之受宗室贵戚怂恿而捕杀商鞅，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秦国的改革步伐。秦惠文王年龄既长，思想更为成熟，他意识到车裂商鞅实为一个错误，自我反省后坚持改革，先后任用公孙衍、张仪等，继续开疆拓土，展现了王者气度和霸者手腕。秦国的积极扩张，引起了东方各国的警惕，它们开始互相联合共同对抗秦国，即“合纵”；而秦国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逐个击破，即“连横”。秦武王孔武有力而雄心勃勃，曾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继位二年便初置丞相，三年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为进一步通三川打下基础。但武王的梦想并未实现，四年，因举鼎绝筋，伤重而死。其异母弟即位，是为昭王。昭王在稳定内部之后开始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白起、司马错等大将屡破韩、魏两国城池，秦又与五国联合攻齐，当时实力最强、能与秦抗衡的齐国几乎被灭，秦由此确立了对六国的优势。昭王在位五十六年死，位传孝文王，后至庄襄王。庄襄王三年死，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一统天下前，因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和治国方略的影响，专图富国强兵，对学术和文艺很少提倡，对法家以外的诸子论说更多持排斥态度。因此，战国时代秦国思想领域相对贫瘠，没有培养出一种影响时代和诸国理论学说。

秦王嬴政亲政后，任用李斯、尉繚、王翦、蒙恬等一批文武大臣，励精图治，沙场纵横，开始了统一六国的事业。自秦王政十七年俘韩王安，至二十六年虏齐王建，前后十年内，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依次灭亡。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一个西起流沙大漠，东至东海，南抵南海，北临山海关的地域广阔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首开封建大一统局面。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诸领域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国家制度方面，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组织结构是：一、皇帝为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全国的权力。二、中央机构由三公、九卿两级组成。三公为皇帝的行政、军事助手，九卿则分工负责庶政；还有列位将军以掌征伐。三、地方行政为郡县两级制，由皇帝任命行政、军事长官。上述主要官吏的选任，不论亲疏，而要选贤任能。这些制度都与当时新确立的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即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适应。”^①

^① 张传玺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在经济发展方面，秦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经济的措施。其一，确立土地私有制。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允许私人自行占垦经营，统一税率，正式宣告了土地国有制下授田制的结束，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其二，统一度量衡。秦一统天下当年，秦始皇下了一道四十字诏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其三，统一货币。《史记·平准书》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其四，统一交通制度及建设水路交通。秦统一后，规定“车同轨”、“舆六尺”。又下令拆除六国自设障碍，以便利交通往来，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开辟了水路交通网。其五，迁徙人民。多次大规模的迁民，拓荒实边，抗侵备军，有效地发展了生产。

在军事斗争方面，继续对边战争，以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吞并六国后，秦已无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行动，但南越、东胡和匈奴与秦的边境矛盾仍旧存在，为保证边境安定，令周边少数民族归附，秦国军队继续进行战斗。秦始皇派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向东南及南部攻取越地。并将五十万罪徒谪戍到五岭以南与越人杂处以戍边和开垦，南越地区自此皆归入秦朝版图。在平定南方的同时，秦始皇又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地区。并在夺回阴山一代地区后设三十四个县，重新置九原郡。又迁内地三万户北河、榆中屯垦。秦王朝还征发大批人力在原秦、赵、燕长城基础上修葺、新筑长城，竖立一道绵延万里的军事屏障。

在思想文化方面，坚持法家思想，统一语言文字，焚书坑儒。商鞅变法产生的效果立竿见影，秦国自此以后持用法家学说，以之为主导思想从未变更。秦王嬴政掌权，韩非法、术、势结合的理论得到信用，进一步强化了秦国的法家思想传统。秦一统天下，面对“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战国积习（《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更坚定了任用法家学说的决心，禁绝百家。秦逐渐走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极端。秦之文艺文学随之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宽松环境。

为愚民、弥谤及任法，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接受其建议，并据此下焚书令，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秦始皇沉迷于求仙问药，屡屡受挫，又受方术之徒诓骗，十分愤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

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谏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同上）于是派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牵连，秦始皇亲自判处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杀于咸阳。

焚书坑儒，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其关键之处不在于古籍的完全毁灭和儒士之丧，毕竟被坑杀的儒生只占士之整体的很小一部分，而从实行焚书政策到秦代的灭亡不过六七年时间，朝廷不可能消灭所有民间藏书。影响最大的是此类事件的震慑作用和象征意义：士人们不再拥有战国时期议政评君的自由，独立的文化地位被剥夺，争鸣的思想被扼杀，多样的文化形式被消解。正如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说的那样：“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十批判书》）功利而苛暴的时代氛围，禁锢思想的文化措施，无疑不适宜文学的成长和文化传统的承续，所以说“秦世不文”。

当然，秦出于政治需要又非全然毁弃文化。明人张燧指出：“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尝恶书。观其读李斯逐客书，则亟毁初禁，开关以纳之；读韩非说难，则抚髀愿识其人，其动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后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固未尝替。”（《千百年眼》卷四《秦不绝儒生与经籍》）可见自周至汉，秦文化虽为低谷，然文脉未全然断绝。秦代最为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统一了汉民族的文字。战国时期，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地的文字有很大的分歧。在关东使用的文字，被称为“六国文字”，秦国的文字则称为“小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过程：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秦始皇下令对各国原有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规范文字，在全国颁布推行。与此同时，人们又创作出笔划直线方折，结构方正平整，书写便利快捷的隶书。这种字体因便于快速简省的书写，不仅在民间流行，也被用于政府的文件中。文字的统一，对政治、经济的统一，文化的传承和推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秦代亦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是秦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及李斯的

政论散文。《吕氏春秋》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它取材很广，被列杂家，在综合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有为秦立法的用意，亦是战国末年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李斯可称作秦代唯一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谏逐客书》劝说秦王取消驱逐客卿的命令。文章善用比喻，说理透辟，气势奔放，音节铿锵，既存战国策士纵横激辩的遗风，又开汉代辞赋铺张扬厉的先声。秦始皇巡游各地，常刻碑铭文以记其事以颂其功，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记录的“秦七刻石”。这些应制之作的文学价值虽不高，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一统天下后的国家气象，其语言节律亦有闪光之处。在政府颁发的文书中，也有一些讲究语言形式与押韵，吸收民歌特点的作品。如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就有通俗活泼、音韵和谐的句子，“凡治事，敢为固，遏私图，画局陈棋以为籍。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显示出法家文章的格调。《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仙真人诗》等，可惜今俱不传。秦代固然有文章，但是从整体而论，“政无膏润，形于篇章”（《文心雕龙·奏启》），刘勰“秦世不文”的说法，可谓切中肯綮。

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它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它如同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虽曾闪烁耀眼的光芒，却转瞬即逝。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注定这充满戾气与功利的政权难以长久；以法为教，焚书坑儒，又宣告了文化模式的错误选择；求仙问药，所托非人，更激化了潜在矛盾，孤立了新生政权。秦始皇三十七年病死沙丘，赵高、李斯串谋矫诏帝命，公子扶苏被迫自杀，更为昏庸残暴的胡亥继位。百姓人民怨声载道，慄若探汤；官僚贵族离心离德，惶惶不安；二世胡亥骄奢残暴，饮鸩止渴，帝国大厦颓然将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辉煌一时的秦王朝轰然崩塌。为世人留下一段惊心动魄而不堪回首的记忆，为中国文学留下一段无限尴尬而苍白可叹的历史。

第二章 大汉风云中的文学演进

汉是中国继秦之后第一个疆域辽阔、高度统一的封建王朝。四百年间，两汉的思想政治与文化文学几经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公元前202年，随着项羽的战败和死亡，刘邦无可争议地称帝建国，汉朝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自刘邦君临天下至汉景帝为西汉初期。这一时期由于经历了秦末战乱，民生凋敝，经济颓靡，百废待兴。汉初统治者为了纠正秦严刑苛法之弊，恢复生产，稳定秩序，选择了便于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为主导思想，推行清静无为的治国理民方式。“君臣俱欲无为，……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赞》）。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终于成就了被后世褒美的“文景之治”。

汉初为恢复几欲断绝的文脉，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使散佚的文献古籍得以辑存整理，又除所谓“诽谤訞言志罪”，令噤若寒蝉的文人士子敢于发声，思想文化领域因之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崇尚黄老与秦代唯法是用是决然不同的，它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而更近于思想上的一种倾斜。从根本上讲，汉初的黄老主张是以道家学说为主，融合儒家、法家、阴阳、纵横等多家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因此诸家思想学说都保有生存的土壤，它们存在、流衍、撞击和融合，使汉初文士形成了活跃而复杂的思想。如陆贾近乎纯儒；贾谊存儒、法之思，又兼有道家说辞；晁错基本属于法家，但不乏儒家观点；而枚乘、邹阳等人则明显有纵横家气息。由秦代独任法术之学，到汉初以道为主而兼综百家，是统治阶层的决断，更是文化复兴的必然选择。汉代政论散文和辞赋就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以及诸说杂存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兴盛起来。文人士子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感受到了宽容温和而蛰伏欲动的时代气息，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从现实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及巩固新生政权等问题抒发议论，创作了大量政论散文。代表作家作品有贾山《至言》、贾谊《过秦论》与《陈政事疏》、晁错《论贵粟书》等。汉初文人又继承诗骚传统，以辞赋抒发情感，虽受身份地位与经历所限，在思想的深沉度与感情的强烈性方面无法媲美楚辞，但也抱诚守真，文采飞扬。贾谊《吊屈原赋》与《鵬鸟赋》，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

乃个中代表。随着统治阶级享乐风气的逐渐形成及文人思想感情的变化,辞赋又现出了新面貌,即由骚体的抒情怨叹变为散体的叙事体物;由尖锐的讽刺斥责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由随性自然的放纵思绪变为层层递进的主客问答。枚乘《七发》即是赋体作品发生这一转折的标志。

汉初政治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割据的现象,这令文学也出现了藩国文学与中央文学之别。刘邦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分封,无所藩屏,于是他在统一天下后剖裂疆土,分封功臣为异姓王,分封子弟为同姓王。“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迄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这一方面给汉天子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留下了隐患,另一方面也刺激了藩国文学的兴盛。汉初诸侯王或喜好文学,或想获得文雅之名,或为壮大实力延揽贤才,多积极招聚文人士子,吟游唱和。兼之此时纵横之学犹存,秦时对游士的反感、打击既去,士人为寻找出路又开始游走四方,纷纷归附诸侯王,如主父偃遍游齐、燕、赵、中山,枚乘、邹阳久为大国上宾,在两方的积极努力下,形成了吴、楚、淮南、梁、河间等数个闻名遐迩的文学集团。藩国之中文士云集,议论时政,著书立说,游士宾客之盛,王侯文学之崇,一时形成与质直少文的中央汉廷文学判然有别的浮辩尚辞、典雅崇经的文化景观。如果没有藩国文学,定然没有汉初文坛的争鸣之势,或磊落不平,或余韵长音,或感怀悲慨,或豪情壮志,开启了汉代文学舞台上重重帷幕;如果没有藩国文学,文学之士也定然不会在一时间麇集宫廷,或歌功颂德,或叙事体物,或慷慨陈词,或委婉劝谏,在帝王周围重新聚集成一个群体,上演汉代文学最为精彩的一幕幕。文、景以来,心怀二志的诸侯与异常活跃的士人结合,对封建集权统治的威胁和破坏越来越明显,七国叛乱、淮南王谋逆、梁孝王骄纵等一系列事件更直接加重了中央与藩国间的矛盾,平叛和削势势在必行,中央王朝对诸侯王屡有抑黜,至汉武帝中期终于完成这一工作。权势日弱的诸侯不能为依附的游士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和功名利禄的保障,这些人渐而由地方转投中央,由诸侯转效天子,文学中心从诸侯藩国移向中央王庭。如枚乘因两谏吴王刘濞而被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司马相如、枚皋、主父偃等亦都归向汉廷。至汉武帝时,国家制定了系统的选拔人才的科目及规则,文学经术成为晋身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从此士人的出路总归于一,藩国文学向汉廷统一文学转变。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的转化,犹如一条纽带,连接了汉代文学肇造与鼎盛两个时期。

汉武帝至汉宣帝为西汉中期。政治上,武帝继文、景之治,施行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的方针,彻底消除了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大一统帝国

的版图格局。军事上，将帅奇才铁马雄风，兵卒勇猛关山雷动，主动出击匈奴，基本解除了秦以来匈奴对北方的侵扰，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经济上，经过汉初休养生息，经济秩序得以恢复，家庭自足国有余粮，“至今上即位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统一货币，建立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制度。文化上，积极施行多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干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武帝时期，不但典籍书册得以保存、整理和充实，还利用祭祀建立新的符合大一统理念的神系，更设立乐府机关，采诗、演唱及谐比音律。文化事业出现了“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的盛况。

汉武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关键的总结，莫过于在甄别诸子学说的基础上，大倡儒旨。汉王朝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显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新气象，“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已与强盛国力不相匹配，统治者需要选择一种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指导思想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于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在经过汉初的思想自由与活跃期后，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统一了思想。主张积极有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学由此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儒家学说既能起到法家区分等级、明确关系与职责的作用，又能安抚人民、消除抵抗情绪；既能强化君主集权制度，又能保证各阶层的基本生存需要；既能有效限制思想自由，又不阻碍文化经济的正常发展。于是儒术赢得了官方的礼遇，经过统治者的认可和肯定而超轶其他学派，由一种诸子之说变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遵循的法典，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中国学术的主流。汉代文学也因之受到影响，经学典籍、经学理论、经学阐释方式以及经学取士制度，对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及文学鉴赏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阶段总结历史经验以解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策略，是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因此文化思想方面又呈现整合性趋势。如刘安《淮南子》就是一个汉代思想融汇先秦百家之学并欲以指导实践的缩影。它糅合和儒、法、阴阳等

多家思想,建立起弥纶天地、涵盖古今、气势恢宏的书写体系,对汉初的文化主潮作了全面的概括。《淮南要略》称:“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又如桓宽《盐铁论》通过记录贤良文学与朝臣对盐铁官营问题的论辩展现出儒法两家不同的治国理念。文人眼界与胸襟的开阔,兼容并蓄思想的形成,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推动了文学作品体式的创新,铺张扬厉,宏衍巨丽,融会古今,体国经野的散体大赋兴盛起来。司马迁《子虚赋》与《上林赋》作为散体大赋的经典范本展现了“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在史学领域,则出现了具有会通精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报任安书》)。

西汉中期,经学对文学的影响已经显现。“汉代的文学发展大体上是沿着先秦以来的《诗》、《骚》两大传统向前演进的。由于经学昌明,儒家的伦理实用价值观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所以使得汉代文学前进的脚步不但显得十分滞重,而且经常背离文学的发展轨道。”^①此时经学对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董仲舒积极建立起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一种核心理念已经渗入到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中,文人总在行文作赋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探讨天人关系,并用今文经学规范和引导文学创作。在经术化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下,生动活泼的“诗三百”蜕变为“诗经学”,开始了它由文学文本向经学文本全面转化的扭曲过程,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被人为消解。

西汉之衰,始于元、成之世。汉武帝的赫赫战功是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为代价的,刘彻在位后期的穷兵黩武及巫蛊之祸极大地消耗了汉王朝的元气,随着他的崩逝曾经被压制住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迅速激化,大一统局面出现危机。汉昭帝八岁继位,在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等重臣辅政下,沿袭武帝后期政策,对内与民休息,对外加强戍防。终使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得到了有效控制,王朝颓势得以扭转。昭帝无子,戾太子刘据之孙刘询继位,是为汉宣帝。刘询在位时剪除霍氏,夺回皇权,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勤勉治国,保民安民,进一步恢复了国家实力。与前代天子的统治并称“昭宣中兴”。其后汉元帝刘奭于公元前48年以“柔仁好儒”、“优游不断”的性格在其父宣帝刘询“乱我家者,太子也”的预言中登上帝位(《汉书·元帝纪》),汉代自此历经“湛于酒色”的成帝、“飡国不永”的哀帝、“政从莽出”的平帝,国祚不兴,王权旁落。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本欲有所作为,以三代政治为理想变法改革,以儒家经义为法典指导实践,但诸种举措过于理想化且朝令夕改,令其统治不但没有

^①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解决社会危机，反而引发更大的社会混乱，结果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抗，终遭覆灭。

西汉后期的学术思想虽延续武、宣之世儒学独尊局格，却失去了内在事功精神与文化生气，在由繁荣趋于沉闷的过程中向两方面演变：一是大讲讖纬的今文经学受到复古求实的古文经学冲击。今文经学家受董仲舒影响，以阴阳、灾异说政治时事，日益荒诞迷信。同时，拘泥师承，囿于章句，在皓首穷经的过程中儒学经说变得越来越空疏无用。王莽托古改制，在学术思想上提倡古文经学，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从民间走入王廷，开始了与今文经学持久而激烈的斗争。一是道家思想重新闪现光芒。随着王朝的衰落与士人晋身道路的阻塞，汉中期曾普遍激励着人们的经世致用的理想逐渐幻灭，充溢满怀的时代豪情与激昂精神也已淡化消逝。文人在壁垒森严的经学斗争中寻觅不到前进的方向，士子在黑暗的现实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于是，汉初曾起过极大作用的黄老思想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汉代正统思想中出现了异质因素。

在文学方面，此时是西汉文风向东汉文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结点。西汉后期的文学大都受重师法传统、阐释义理的今文经学影响，渐失汉鼎盛期文学的创造性，善于模仿。如扬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以司马相如《上林赋》为式，《解嘲》又模仿东方朔所作《答客难》，但其在模仿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色。还有一些二流赋家的作品在内容、结构、体式、乃至辞藻运用方面十分雷同，已全然失去了活力和生气。西汉后期的文学作品还长于引经据典。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论汉代文章转变曰：“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在司马相如、王褒后，自刘向、扬雄以来的这种文章写作上的变化，实与士人的儒者化、文章的经学化相关。所谓“引书以助文”，突出表现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上。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到：“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模仿与引经据典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和文学体式的创新，但并没有泯灭此时的文学创作激情，仍有十分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如刘向《列女传》、《列仙传》、《说苑》等书，将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分类、加工，引之喻说其政治见解或某一道理，情节生动丰富，刻画细致传神，为汉代小说代表。汉赋创作亦有较大变化，歌功颂德的作品少了，而抒泄对浊世昏君的不满、有较强讽喻精神的骚体赋再度兴盛起来。刘向之《九叹》、刘歆之《遂初赋》为其代表。乐府在西汉后期仍蓬勃发展，历昭、宣、元、成数朝，民歌俗乐风靡乐府，至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乐府的影响并没有因之减少，人们